

ZHONGGUO DANGDAI MINGJIA XUESHU JINGPIN WENKU

主编 刘继才 郭爱民

中国当代名家学术精品文库

王立卷

汉语言文学类

王立著



东北大学出版社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主编 刘继才 郭爱民

中国当代名家学术精品文库

汉语言文学类

王立卷

王立 著

东北大学出版社



© 王 立 201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当代名家学术精品文库：王立卷 / 王立著. —
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19.5
ISBN 978-7-5517-1929-2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②中国
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C53 ②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57182 号

出 版 者：东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文化路三号巷 11 号

邮编：110819

电话：024-83683655(总编室) 83687331(营销部)

传真：024-83687332(总编室) 83680180(营销部)

网址：<http://www.neupress.com>

E-mail: neuph@neupress.com

印 刷 者：沈阳市第二市政建设工程公司印刷厂

发 行 者：东北大学出版社

幅面尺寸：170mm×240mm

印 张：21.25

字 数：419 千字

出版时间：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孙 锋

责任校对：孙德海

封面设计：潘正一

ISBN 978-7-5517-1929-2

定 价：88.00 元

文学可以自娱、娱人，更能
由此深切地体悟人生，认识外在
世界。文学主题学将世间百态的
历史图景与心灵现实专题化，有
助于把握人的情感流程展演历史和
未来世界。愿我们共同喜欢，
乐此不疲。

王立

《中国当代名家学术精品文库》

学术委员会

主 任：傅璇琮

副主任：彭定安 娄成武 林木西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振纲 艾荫范 田鹏颖

刘继才 陈 凡 林木西

娄成武 夏中华 郭爱民

傅璇琮 彭定安

出版说明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花在雨露滋润下竞相开放，出现了繁花似锦的美好景象。春华秋实，硕果累累。在这些科学成果中，既浸透着老一辈专家辛勤耕耘的心血，也留下了中青年学者努力探索的足迹。这是“学之大者，国之重器”。为了总结他们的学术成就、展现一代学人的风范，我们从他们的学术著作中遴选出精品，重新编辑出版，以求一册在手、精华尽览，以免去读者东寻西检之苦，既便于阅读，又便于珍藏。

《中国当代名家学术精品文库》（以下简称《文库》）入选的图书，是一批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其中不乏填补学术研究空白的力作。其作者大多是国内某一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他们的代表论著，基本上达到了国内一流学术水平。

为了保证《文库》的出版质量，我们特聘请几位学术大家担纲学术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以指导我们的工作。他们是：国学大师、著名文化学者，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兼秘书长，中华书局原总编辑、编审，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傅璇琮教授；著名学者、文学家，辽宁文史研究馆馆员，辽宁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原副院长，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名誉院长，辽宁省文联顾问，中国鲁迅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副会长，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彭定安先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办MPA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公共管理类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常务理事，全国公共管理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家级教学名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东北大学博士生导师、原副校长娄成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组部“万人计划”入选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

科评议组成员，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共辽宁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辽宁省“攀登学者”，辽宁大学博士生导师林木西教授。

对入选《文库》的作者设定的“门槛”是：“两院”院士、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二级以上正高级职称者。但我们又不是唯职称论，那些确有真才实学而从未参加职称评定的知名学者，也在入选之列。我们秉承“三不选”的原则对入选者的论著进行遴选，即：不代表高水平研究成果的论文不选，观点陈旧的文章不选，一般应酬性、无学术价值的序言不选。所入选的论文虽然大多在公开的报刊上发表过，但这次重新出版时，作者均对自己的文章进行了程度不同的修改和完善，有的论文补充的文字甚至超过原文的一倍以上，既具原创性，又有一定前瞻性。编者在文稿审读、装帧设计、材料选择和印刷装订等环节全面贯彻精品意识，力求精益求精。因此，《文库》的出版并非“冷饭重炒”，而是力图有所创新，俾使读者一快朵颐。

在首批人文学科的著作中，既有学界泰斗和知名老专家的成名之作，也有优秀中青年专家的论文选萃。其学术风格同中有异，异彩纷呈。这里既有逻辑推理的严密，又有形象思维的疏朗；既有高深的学理，又有浅近的知识；既有洋洋洒洒的长篇宏论，又有短小精悍的学术精品；既有层层剖析的透辟，又有娓娓道来的轻松。阅读这些著作，仿佛置身于科学的百花园，令人目不暇接，获益匪浅。当然，是否如此，尚有待读者诸君的品评。

本《文库》的第一批著作，推出人文学科5本、自然学科5本。以后每年我们都将陆续出版一批这样的论著。

这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出版工程，不仅需要学界专家的配合，而且冀望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让我们大家一道，努力把这项有利于学术繁荣和文化遗产的工作做好，为伟大祖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增光添彩，使科学园中的百花争奇斗艳，更加绚丽多姿！

东北大学出版社

2014年8月26日

序 言



今年五月，王立兄从大连打来电话，说他的论文集即将出版，希望我能写一篇序言。接此电话，我真是有些诚惶诚恐。我知道这是王立兄对我的信任，难以推辞；但是我对主题学实在没有深入研究，恐难揭示其大作精要，有负重托。不过我和王立兄是相识多年的老友，只得从命，同时也愿意借此机会叙述友情，并表达我对他的敬慕。

说起来，我和王立兄相识甚早。我们同为 1977 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届本科生，我就读于沈阳师范学院，入学时名叫辽宁第一师范学院，他就读于锦州师范学院，入学时名叫辽宁第一师范学院锦州分院，虽然两所学院没有实质上的联系，可是从名称上看却同属一家，我二人也算是“校友”了。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1981 年暑假他来到沈阳师范学院，我们和几位同学一起准备那年冬季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同吃同住，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以后我们虽然不在一起读书，却始终保持着联系。世上有许多机缘凑巧之事，我 1987 年博士毕业之后到青岛大学工作，自 1993 年开始兼任曲阜师范大学研究生导师，而王立兄则先到烟台师范学院工作，后来又回到曲阜师范大学任教，我们二人又在曲阜相逢。此后，我因为工作关系调到北京，王立兄则先去吉林大学，又回到辽宁，其间又到上海求名师深造，学问更是日新月异。不管走到哪里，我们的联系从未中断，他几乎每出一书，都要送我。在我的书架上，王立兄的著作已经排成一列，这不仅记录着我们之间的学术交流，更是多年友谊的见证。此时此刻，我与王立兄共同复习准备考研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想当年我们风华正茂、自命不凡、寒窗夜读，不以为苦，憧憬美好的未来，多少青春的浪漫。转眼之间就两鬓白发，真是有无限感慨！

国内的主题学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才得到蓬勃发展的一个领域。就我个人所见，其兴起首先得益于那个思想解放、学术活跃的时代，具体来讲则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对传统的文学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反思，第二是新方法、新思潮的涌动。和传统的文学社会学研究方法相比，特别是和多年来已经形成的“时代背景→作家生平→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的僵化研究模式相比，主题学研究以其特有的焦点透视方式与开放的文化视野来重新审视文学史，在不同时代的不同文本中找到一些共同的问题进行新的阐释，的确让人耳目一新。王立兄同当时一大批刚刚步入学术领域的青年人一样，既得风气之先，又正值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人生黄金时段，自然就成了站在主题学研究前沿的弄潮儿。他以其敏感的学术视觉，很快就进入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并展现其才华。在我的印象中，他从1985年开始发表与主题学相关的论文，在《黍离之痛与悲秋——中国文学史中两条美学线索的比较》（1985）、《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春恨主题初探》（1986）、《春恨与悲秋——中国文学史中两种美感体验形式的比较》（1986）、《柳与中国文学——传统文化物我关系一瞥》（1987）、《略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悲秋主题》（1987）、《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相思主题》（1987）、《先秦文学中的梦境描写及其历史地位初探》（1987）、《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惜时主题》（1988）、《中国文人的悲歌心态——我国古代文学中的出处主题试探》（1988）等之后，到1988年在《文学评论》第6期上刊载《中国古代思乡文学侧议》，便更引起了学界的关注。1989年，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中国古代文学十大主题”的说法（《中国古代文学十大主题概观》，《江海学刊》1989年第2期），并于次年出版了《中国古代文学十大主题——原型与流变》（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书，引起很大反响，成为学术新星。此后则持续勇猛精进，1995年在中州古籍出版社一次就推出了《中国文学主题学》四本大著（包括《意象的主题史研究》《江湖侠踪与侠文学》《悼祭文学与丧悼文化》《母题与心态史丛论》），让人惊呼其高产和高效，实多年积累而致。据此书中介绍，那时他就已经在包括《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在内的全国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了100多篇论文，仅在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上就全文转载了超过30多篇。不久，他又推出了《中国古代复

仇文学主题》(1998)等。这些论著视野开阔,内容丰富,立论鲜明,令人耳目一新,从此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主题学研究领域里的领先地位。

王立兄几十年来一直在主题学领域辛勤耕耘,此后又出版著作多部,发表的论文更多,以至于我们今天只要提到中国古代文学主题学研究,王立兄就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何以如此?我想,一方面因为主题学本身就是一个开采不尽的富矿,这是王立兄所以取得如此成就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也说明王立兄是个用心专一、做事执着的学者。当下社会的发展趋势是分工越来越细。现代社会需要通才,但是更需要专家,只有专心致志地在某一领域里长期深研,才能占领学科高地,才能做出更大的贡献。打个比方,如竞技体育,在奥运会的赛场上,虽然有十项全能选手,他们在十个项目中都有超出一般人的水平,可谓真正的全才,其中的冠军更是让人仰慕。但是大家更关注的还是那些在某个单项上取得杰出成就的运动员,如撑杆跳高名将布勃卡,百米飞人博尔特,等等。何以如此?因为他们在这项运动中做到了极限,代表了一个时代人类所能取得的最高成就。学术研究何尝不是如此?时代需要十项全能的学者,但是更需要像布勃卡、博尔特这样杰出的人才。然而,要在一个领域里取得如此成就何尝容易?当一个人的水平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想要再往前突破一点都很困难。这意味着他要有勇攀高峰的雄心壮志,还要有坚强的意志和持之以恒的精神。王立兄三十余年执着于主题学研究,不断地超越自己。仅此一点,就足以让我敬佩不已了。

展现在我面前的《中国当代名家学术精品文库·王立卷》虽然是王立兄的一本论文集,但是一看目录,就可知其内容的丰富。里面所选文章分为五编,包括抒情文学主题及意象研究,复仇、悼祭文学主题研究,武侠文学研究,文学主题学及其研究史,小说母题及其跨文化研究,基本涵盖了作者研究主题学的各个方面。这些研究虽然有着先后时期的侧重点,但不是一卷卷、一部部写的,而不少是呈现出持续性、齐头并进错综交织的,逐渐延展到主题学视野下新的系列课题的捕捉、开创、嫁接、移植、分蘖等等,看得出数十年研究过程中他的勤勉执着。尤其可贵的是,如同本书所收章节下注明的学术史脚印,许多课题的提出或系统化当是最早或较早来

系统进行的，为后来不断丰富的问题、同类型研究打开了诸多新思路，并非浪得虚名也。尤其是20多年前在上海追随名师攻读博士学位之后，王立兄的研究向包括武侠文学在内的小说母题跨文化溯源研究拓展，不仅陆续面世的多部佛经文学影响研究论著（仅纳入季美林主编“东方文化集成”的就有两部），涉及古代小说佛经母题溯源的讨论已不少于百余个题目，而包括还珠楼主、金庸小说文本来源研究在内的武侠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达到百篇以上，也铺展得有声有色，其中许多可以看作向主题学的摇篮——民间文学母题研究——的回归。总之，这些成果还体现出主题学研究的跨文化视野及其蓬勃活力。

本书所选论文最早发表于1987年，最晚发表于2017年，时间跨度三十年，作为多年数百篇研究论文的精选，是一部精心编撰之作。我想，这是作者对自己的主题学研究历程所进行的一次梳理、总结，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无须我赘言，读者自会做出应有的评价。如今此书即将面世，在此，我先要向王立兄表示衷心祝贺。

最后，在这里我还想向王立兄提一个更大的希望，希望他能在近几年写出一部有关中国古代文学主题学概论或者导论式的著作。中国文学主题学研究已经发展了三十多年，产生了大量的优秀成果。也许是孤陋寡闻，我至今还没有看到一部系统地论述中国文学主题学基本理论的著作。当然，在此前的相关论著中，也不乏一些涉及或者讨论过中国文学主题学理论问题的成果，有的也相当深入。但是，相对于中国文学主题学这一广阔的学术领域而言，以往的相关讨论已经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提供了众多有价值的实证性的个案成果，但还是远远不够的。学界需要有人对三十余年的中国古代文学主题学研究进行一次系统的理论总结，规范学科领域，建构更为完善的学术体系，如此方能将主题学研究不断发扬光大，开启后学。我认为这一重任非王立兄莫属，期待着王立兄再创辉煌。

赵敏俐

2017年6月29日于京西会意斋

前言

文学主题史研究，是主题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需要突出一个特定主题、母题或意象发生、发展演变的历程。

主题史的梳理，与文学史学史的需要密切联系。主题学研究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主要的不是摇旗呐喊的理论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不言自明，作为不限于某一具体学科（民间文学、古代文学、比较文学等）的理论方法，主题学在不同学科、不同学科的学术发展阶段乃至具体课题探讨的侧重点上，都是很难一语说清的。在一次古代小说学术史会议上，有学者呼吁要进行“学术转型”，笔者就曾直率地提醒：对我们学科（古代文学）来说大部分研究还是“新”的东西（“新方法”“新理论”等），其实在其他的学科早已属常识，不能期待过高。就我本人来说，主题学研究的工作习惯，久之难免影响到对既有成果的审视眼光，对于在同题、近似题目研究中取巧易得之作的敏感——同题同类的探讨故意避开既有成果。

主题学、主题史的名称虽说从国外传来，但相关思维路径、研究实践早已在古代文学学术史上盛行。20世纪末，文学史、学术史撰写热开始，迄今鲜见对偏重古代文学的主题学研究史的原创论著。^①迄今面世的古代文学研究学术史，以其量大面广，任务艰巨，多采用“众人合作”的方式撰写，表现在明清文学史总结中比较有特点，就是用少数主要“名著”的学术史“部分代替全体”（往往也有一些搭配“二三流”作品研究史的，但比例明显过少，一方面的确研究的少，另方面也带来一种错觉，即这些作品学术史的^②价值、比重挺差，挺尴尬的），这样是否也在认同、强化着一种理念——文学史（这里主要指小说为主的明清文学）尤其是古代文学研究史，主要是古代文学名篇名

① 相关论著有陈鹏翔：《主题学理论与实践：抽象与想像力的衍化》，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1；万建中：《中国民间散文叙事文学的主题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以及王立：《中国古代文学主题学思想研究》，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等等。

② 皎然《诗式》卷一概括为“偷语”“偷意”“偷势”，认为：“三偷之中，偷语最为钝贼……其次偷意，事虽可罔，情不可原，若欲一例平反，诗教何设？其次偷势，才巧意精，若无朕迹，盖诗人闾域之中偷狐白裘之手，吾亦赏俊，从其漏网。”

著研究史？这才是“精品”？而且，如是操作带来的一个纠结，就是与专书的专门学术史的关系处理。既有三国水浒金瓶梅红楼梦等学术史专著，那就有一个孰先孰后、谁吸收覆盖谁的问题。实际上，名之为“名著研究史”也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会派生出对名著生成研究这一题中自有之义，这不能不牵涉到名著与众多非名著、其他多种文学非文学作品的复杂关系问题。这，大多也不免成为赞成“悬置名著”的主题学研究面对的、不可回避的问题。

文学主题史，原本是每一时代、每一作家作品研究都无法忽视的。具有七情六欲、角色身份各异的人，是文学史书写的主体，人之性情、眼中之景、心中情事，固然千变万化，然而对于特定文化史空间存续的中国古人，却有着较为恒定的模式，这些模式与一些“专门史”、民俗心理联系的密切程度，其跨学科的程度，甚至远远比我们文学研究者理解的要大。可以说，在“史胜于文”的文化传统中，古代文学研究进入史学、文献学、文化史研究或者广义上的人文研究，趋势与主流，正是因为文学史研究对象之丰富复杂性质所决定的。

注意到文学史——习俗文化史研究的这种“多元共生”、多位一体现象，正是民俗学研究前辈所较多发现的，这也不能算作文学史研究后辈的功绩。一般来说，是众多研究实践的积累，得出了这一可以信服的理论。如刘守华先生的研究，就带有这一特点。民间故事史研究、文学史研究、心态史研究、专门史研究等，所面对的基本材料还是大致相同的，这些学科之间一直存在着互动互补、彼此采借的情况。

最近四十年我国文学主题史的研究基本上留下了这一历史轨迹。首先，文人抒情文学被视为文学史的正宗，事实上也是宋前文学的主要构成，由于中国文学讲求因革求变，而前期的儒家、道家思想，道教、佛教观念，特别是《诗品》《文心雕龙》《文选》等早期的文学观念，实际上与文学创作、接受联袂而行，给后世的文学史、文学观念及其内在关系带来了许多塑模、定调作用，如果主题学未能在这一“文人抒情文学”领域占据全局性的地位，整体体系就无从建构。其次，主题学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偏重历时性演变的路径，因此，必须确立早期“诗骚并举”、太史公“发愤著书”“文章传世”等在文人抒情文学内在动力系统中的功能。再次，文人抒情文学作为主流文学的主题、母题系列及一套话语系统、尤其是带来“古诗之妙，专求意象”的象征体系，是在早期文学中确立的，主题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即在此。

文人抒情文学的主题史研究，定位在古代文人以文人群体的“文化身份”自许，个体文人心态的抒发流露，主要以诗词歌赋一类文体为载体，表达与其群体身份相符并由其所决定的成就动机、亲和动机等辐射下的“十大主题”——这里的“十大主题”不是唯此为大、仅此为大的意思，而是偏重在较有连贯性、稳定性、代表性的主题（并非有的仿制者理解的那样，如果就连

“从军”也算作一个“主题”，逻辑上就不具有同一性了）。

与文人群体心理生成流变互为支撑的，是文学意象的主题史研究，主要构成了古代抒情文学为核心的话语体系，艺术审美思维的运作路径。汉语中的意象，作为诗词为主要载体的语词符号，许多依托着深广意涵的“文化丛”。由物态文化、制度文化到观念形态的文化，一个惯常性文学意象，往往承载了特定的丰富的意义、情愫，而为华夏文化圈中的最为丰富复杂的精神史写照。

与古代礼教制度、文化习俗密切联系的一些主题史，往往呈现出抒情文学与叙事文学结合、雅俗融会的形态，也是古代史传文学惯常关注的内容，后世小说、戏曲取材的文化史渊藪。这里仅以复仇主题史、悼祭主题史来说，便已看出“文化染色体”鲜明而复杂丰富的支流，支流水量充沛，才汇聚为文学史长河的波澜壮阔。笔者曾在《永恒的眷恋——悼祭文学的主题史研究》中概括，复仇主题是青年的心曲，悼祭主题是中老年的追忆：“复仇是个体成长过程中的涉险历练，它是个体在青少年时期热衷谈论、神往的壮举，是冲动的、外向的、功名的话语；而伤悼则多半属于个体走向衰亡过程中的触类伤情，它也是个体在无可回避的归宿面前无可奈何的呻吟，是内敛的、深省的、感伤的话语，一般中老年才每多提起。也许，这正是许多悼祭作品偏偏是在亡者逝去多年之后（事过境迁）才创制出来的原因之一吧。”以年龄的阶段性特征概括某一文学主题总体上的文化精神、审美取向，相关作品“一”与“多”的关系，才便于从主题史的整体流向之中得到把握。特例总是有的，但占绝大多数的无疑是模式化的民俗记忆呈现。复仇、悼祭，两者具有某些共性：一者，都属于伦理文学，极度体现并适应古代中国的宗法制、伦理型社会。悼祭文学与丧悼习俗有密切的关系，礼教对于丧礼、葬服有着详细的规定；复仇文学以为父母兄弟雪怨的“血亲复仇”为核心，作为先秦两汉流行的“复仇制度”的体现，礼教有着严格的、必须执行的规定。因此，悼祭、复仇均为社会教化提倡的正当、典范性行为，文学书写每多成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应然性、正义性弘扬。价值取向的单维性，强固了主题史流向的稳定性，也强化了各自诸多母题类型的单一、趋同倾向。二者，两者虽都有礼教规定，不过悼祭因亲友离去可能属于每个人可能经历的人生变故，一部分人感受得却更为深切，悼祭悲音是亲历者第一人称的倾诉；而复仇虽说是部分不幸者承领的暴力行为（当然也包括正义性动机不足的），文学书写上则多表现为“好人向坏人复仇”，多第三人称的行为描述。三者，悼祭、复仇，对于行为当事人、书写者及其文学受众来说，事实上也是一种人生理念、生存状态以及间歇性亢奋并具有持续性的民俗心态。他们作为现实中的行为主体、主题史中的角色形象，情感心态是在一次次重温着早已有之的精神史偶像、情绪，因而如悼祭主题、复仇主题者，文学主题史的互文性创制、接受联想乃是一种常态。相关情节递进发展、形象性情行为，多半给有经验的阅读者以“似曾相识”的印象，

即使从其他母题中移植一些细节，也难说有几分原创。三十年多年前，安徽大学傅继馥先生曾将《三国演义》人物概括为“类型化”形象，而悼祭、复仇主题中，这类被“类型化”了的人物形象，在在皆是，纵使天才作家笔下有一些更新，也很快被复制，如果不从主题史的角度解读，旧有研究该说的基本上都已说尽。

叙事文学主题史，也往往是故事母题史生成运作的过程史。这里面对的是对万千生活事象的纷杂载录、文献浩繁，如果一般性地企图巨细无遗展示，无异于“老虎吃天”的庞大工程，无所不包，就不是个人著述，而是作坊的批量式组合制作了。这就是自魏晋时代《皇览》始发，唐宋人大规模的类书制作工程，既对相关文献进行分类梳理补充（古代类书《艺文类聚》《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及佛教类书《经律异相》《法苑珠林》等），也对后人辑佚提供了基本的文献资源。一种做法是将原有文献搜集整理，按照时代先后集中起来（如程毅中、薛洪勛、李时人等），一种做法是将主要文本辑要梳理，上挂下联，辨析文本源流，个案式地汇集（如李剑国及其弟子们的系列）；一种做法是把故事划分为类型，上挂下联之后进行简要辨析，按照时代顺序排列（祁连休、顾希佳等）或由此进一步进行故事史勾勒描述（刘守华等）；还有一种，特点是较早并且与国际上的故事分类学接轨，将这种下一步需要多人耕作的文献，不断吸收既有的零散成果，按照时代先后及其原创性，拓开名目，贴上标签，纳入到“AT”分类法的架构之中，以便于检索查询，如艾伯华（1936）、丁乃通（1978）、金荣华（1985）、宁稼雨（2012）等，楼上叠楼，雪团滚起，逐渐愈益细密，篇幅愈大亦情理中事。

因此，拣选出有价值的选题，进行“小题大做”，需要对相关学术史进行较为全面的了解，进行“中观”研究。选题，尤其是避复性而非“换名称（尤其包括换上要比文学之名还大的大名）”“加长版”的选题非常重要，许多前期工作在成果表面之中是难于看出的。材料上、观点上的突破，都应该以前人既有研究为基础，需要尽可能地明确标注出来。

这里需要突出的，主要是较早、最大的中古外来佛经文学的影响，亦即印度、西域文学之于中土文学的撞击、触发，及中国古代文学与南亚、中亚西域文学的题材、表现方式及观念习俗因子融合的历程，除了历史语言学的研究，还罕有能如主题学——母题史研究可如此擅其胜场者。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若从中国文学史流变的阶段性看，中古汉译佛经的母题建构，意义之大，莫过于此。因而严格说来，讨论六朝之后的中国叙事文学母题类型，很难避开外来佛经文学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以小说为主的武侠文学，作为无可争辩的与当代大众文化接轨的题材，也是古代文学研究当代价值经常体现的方面，“古今文学演变”的身体力行者章培恒先生、董乃斌先生，以及陈平原、陈思和，还有台湾的叶洪生、龚鹏程、

林保淳诸兄，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而武侠小说属通俗文学，可与上述文人文学抒情文学、叙事文学构成一种对应关系，大众参与、传播方式由案头而向市井说书坊间、街头演唱推展（或反向、互动），传统题材大略有武侠、艳情、黑幕，而武侠文学，尤其葆有华夏东土的民族性以及慕侠传统。武侠书写而内核为复仇、报恩、民间正义理想的企慕实现，又多昭示出超现实想象，相关套路林林总总，交织叠映，承继性、展演性，带有主题史的绵延特征尤甚，理所当然地成为主题史研究的理想对象，可以说，离开了主题学研究方法，类似于武侠文学、复仇（报恩）主题这类中国文学史最为民族化的惯常题材，就难免停留在就事论事、常识介绍的单一化层面上，而这类研究就很难取得修修补补个别性之外的突破。

由上可见，以主题学方法这样带有普遍性的研究方法，渊深积厚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不可能晚到从“西方”传来，只是受到启蒙才产生主题学研究的，古代文学作品沿波讨源的考察，本来就是未加命名“主题学”、题材史的探讨实践。一者，并非是一些论者常说的所谓仅仅“西方”传来，其实本土早就作为古代文论、诗话一支，零散地运用在溯源、比较上，^①只不过由于比较文学、民间文学学者对欧洲主题学理论情况的陆续介绍，旗帜更加鲜明，且主要运用于民间故事学研究，并没有画地为牢，否认这其实也是一种古代叙事文学研究实践，是“多位一体”的（参见刘守华《比较故事学论考》等）；二者，主题史研究并非与“知人论世”考证相对立的，恰恰是将“知人论世”个案研究的常识数据，置于专题性问题的历时性发展线索之中，考查定位其真正的价值、功能及其成因，只不过主题史论更为离不开系列文本的实证，偏重于同类型文本不同异文的具体流变。因而，主题史讨论更能补充、纠正个案研究之就事论事，单摆浮搁的局限。我们看到了李商隐咏柳，郑板桥写竹，蒲松龄写侠女复仇，其实这不过是柳文化丛、竹文化丛、复仇主题史、心态史的一个环节而已。三者，主题史如不在稳定性、文化惯性极强的“文人文学”领域打开局面，有一个系统观照，其在中国文学尤其后段的通俗文学、民间文学中的适用性、认可度就会大打折扣。

何以近年古代文献热？除了其他常识性、流行性（如数字化电子检索的运用，如一些博士学位论文成为导师博学、有体系的证明等）原因，也是学术史逻辑发展对“戏说”式、介绍式、改写式文章撰写风的反拨。回首20世纪80年代以来诗词赏析的“学术史”，可部分地了解。本来，对古代文学教学科研从业者属于基本的看家本领，但由于易于从某一理论（或曰某一西方思潮）视角来“阐发”一下，再做出结合作者生平事件“传记化”、新闻化的联系，

^① 参见王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的主题学思想》，载《文学评论丛刊》，2002年第2期；以及王立：《中国古代文学主题学思想研究》，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

美文表述的展示，就成为“研究”了，就像对外国读者介绍那样。时间不长，类似成果制作品丛集，繁荣局面不久就呈现出衰颓状。那些“小鲜好烹”的诗词歌赋名作，那些存世作品文字量不大的作家，也特别适合沉迷词句解释的普及。这方面还有一个很常见又不太好意思明说的，就是工作量的多少，其实应当成为学术成果评价的一个标志。而许多依靠中国知网来“攒”出的开会时偶或见到者，总是躲躲闪闪。有的则拿到学位，即毅然决然地远离学术研究。在这种难以遏制的趋势下，又面临着或早或晚整个人文学科被压缩的未来。当然，有如现实生活中那些成功的人生，会成为一种很滋润的生存状态，依靠美文式的表达也不失为学术论著（准学术论著）的撰写方式，这不是较为理想一些的研究者的喜好与专长。

伴随作家作品个案研究的日益细密、相关资料及既有成果检索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学术创新的需要、要求——由重视“提供炮弹”（优质炮弹）到“炮弹射向何方”、杀伤力的追求，主题学研究有着更加广阔的前景及意义。立足文学本位，可以在新的意义层面上，来理解多元化的跨学科思维，来践行古代文学研究的现实意义。限于篇幅，本书未能将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具体研究成果收入，^①如同文学史，文学主题史研究也是一个开放性的结构，试图得出点一得之见，总是在探索、不足的热情与惜憾之中前行，愿师友同道指正批评。

① 如主题史研究对于海洋文学的创获，张陟《“海洋文学”的类型学困境与出路》曾总结：“对于中国古代海洋题材作品的研究，王立的努力引人注目……王立整理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海洋意象，分析了‘海市仙话与古代帝王的求仙实践’、‘游仙文学传统与文人的精神超越习性’、‘雅俗文化离合及文人同大海的关系’、‘海岛巨人食人奇谈的演变轨迹及成因’和‘海中乐园仙声神氛及其伦理、审美内核’等五种主题。……这种将海洋意象与文人心态联系起来纵横剖析的研究方法，不仅深入推进了海洋文学题材文学作品的研究，也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范例。”载《宁波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刘怀荣等指出：“王立是较早对伤春悲秋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一位学者，他不仅提出了‘悲秋’的概念，并从人与自然的角作了初步分析，将春恨引入了研究领域……”“《红豆：女性情爱文学的文化心理透视》……对于爱情文学这块众所周知却又乏人进行深入开拓的领域来说，这本著作的意义是重大的。”“早在90年代初，王立就运用格式塔心理学的观点，对咏侠诗中的复仇主题进行了梳理。他指出侠义建功主题极为契合汉魏六朝的时代需求、精神脉搏、文人心态和尚武重气的个体情趣追求，咏侠诗是‘抒发侠义功业的肺腑之音’，在对侠义复仇和汉代游侠故事的回忆中，‘还时时散发出血腥、悲凉气息与自娱的意味’；东晋后南北朝长期对峙，诗人对秦汉游侠少年的追慕，‘往往体现出诗人在接受历史时较为自觉的选择认同，从而达到心理的补偿与苦闷的超越’。初盛唐的咏侠诗则‘更多的过滤掉不快与夙愿难偿的哀怨，在建功立业不计爵禄的自信中洋溢着乐观与豪迈’。复仇杀人所磨砺的胆识意志和气概，更像是为证明报国的勇武而小试锋芒。中晚唐后，咏侠复仇诗篇‘呈现出向汉代市井游侠回归的趋向’，少年英雄的侠勇武功，不再把建功立业作为目标。”见刘怀荣，等：《二十世纪以来先秦至唐代诗歌研究》，38页，226页，254~255页，济南，齐鲁书社，2006。